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中国
近代
报刊
史

[美] 白瑞华 著

苏世军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014010772

G219.295

14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中国近代报刊史



[美]白瑞华 著

苏世军 译

G219.295
14



北航

C1697162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报刊史 / (美) 白瑞华著 ; 苏世军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12

书名原文: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

ISBN 978-7-5117-1874-7

I. ①中… II. ①白… ②苏… III. ①报刊—新闻事业史—
中国—1800~1912 IV. ①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9758号

中国近代报刊史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饶莎莎

执行编辑: 郑晴蕾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 52162345 (总编室) (010) 52162342 (编辑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16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0毫米×210毫米 9.75印张 3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目录

译序：千古文章未尽才·····	1
前言·····	13
第一章 本土报刊和公报·····	15
第二章 西方报刊的引入·····	31
第三章 中国人对外国报刊的反应·····	47
第四章 王韬与香港报纸·····	59
第五章 条约口岸的外国期刊·····	65
第六章 《申报》与其他上海报·····	83
第七章 报纸发展概况·····	97

第八章 梁启超与改良报刊·····107

第九章 当局与新兴报刊·····123

第十章 革命报刊·····133

第十一章 新报刊与旧报刊·····143

参考文献·····155

附录一：书影图版·····172

附录二：英文原版·····195

译序：千古文章未尽才

本书作者美国白瑞华教授（Roswell Sessoms Britton）于1924年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邀请和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派遣，来华创办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首届系主任，为我国新闻学教育做出具有奠基性的贡献，但他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提前回国，不无遗憾地离开了他在中国以献身精神所开创的新闻教育事业，他英年早逝，54岁便撒手人寰，未能兑现他临别前重返燕京大学新闻学讲坛的庄重而热切的承诺，不禁令人扼腕。但他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却与我国新闻史奠基人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共同构成一副璀璨夺目的双子星座，永远彪炳我国报刊新闻出版的不寻常史册；真可谓无独有偶，戈氏也是中途夭折，年仅45岁便驾鹤西去，中国新闻确实是一项需要献身精神的事业。

一、扎实的汉学功底成为撰写中国新闻史学的基础

白瑞华精通汉学典籍，对中国的甲骨文也颇有研究，他搜集甲骨文甚勤，认真加以整理勘校，1937年即在《哈佛亚洲学刊》

上发表甲骨文研究论文，他勘校的《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
品甲骨文字》一书由奈良天理教道友社出版，他勘校的《甲骨卜
辞三种（外题）即方法敛摹甲骨卜辞三种》由台北艺文印书馆民
国五十五年（1966年）影印出版，已成为甲骨文研究者珍贵的参
考资料。他对中国史料的熟稔程度和驾驭能力是很多汉学家难以
企及的。他充分占有并合理利用史料，为本书打下史论结合的坚
实基础。

白瑞华就本书写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参考文献做出一项说明，
指出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在所有参考文献中引证最多的，
包含100多种报刊的副本和很多原始摘要。戈公振在我国新闻界的
名声如雷贯耳，令人仰慕之至，被誉为我国现代新闻事业和新闻
学的开山大师，他的《新闻学撮要》、《新闻学》、《中国报学
史》等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著作，为新闻学这个新兴学
科在中国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其中，以对中国新闻史
的研究最为精深，他的那部《中国报学史》代表了就中国报学史
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自从1927年初版后，曾多次重印，被译成
日文在日本出版，在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是公认的中国新闻史
研究的奠基之作。至今还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者所推崇，具有
极大的参考价值。像戈公振这样在新闻各个领域都做出杰出贡献
的全才，在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确很少有哪部论著出版四分之
三个世纪以来一直为新闻系主要教学用书之一。

也许是由于白瑞华的这部著作是用英文撰写的，在我国远未
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实际上白瑞华作为国际新闻界的翘楚，早在
上个世纪30年代就为“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
化大师林语堂先生所推崇，林语堂认为白瑞华的这部著作与戈公

振的《中国报学史》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他的英文论著《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曾这样记述两个人所做出的有关贡献：“研究现代中国新闻事业，有两位水平很高的开拓者，这便是戈公振与白瑞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写于1926年，次年出版，至今已出了四版。白瑞华是美国人，他在1931年用英文写作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以下简称《报刊史》），出版于1933年。在这个领域里，两人都是肯坐冷板凳的相当称职的研究者。戈公振积数年之功，收集大量罕见资料，包括很多早期报刊的图版和重要文献的复制品。白瑞华借鉴戈著，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研究，出于对事实的尊重，白氏补充、肯定了戈著，尤其是戈氏关于传教士来华办报活动的研究，他的著作里收集了现保存于外国博物馆的早期报刊图片24幅。”（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1页。）

二、以晚清报刊风云作为独特的断代选取

本书介绍1800—1912年中国报刊的发展概况，包括本土报刊的消亡，新兴报刊的崛起，后者从对前者的严重依赖演变成完全独立的过程。不同的报刊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体系、党派组织或民营企业的心声，构成一座反映长达百余年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各种错综复杂、诡谲叵测的多面体架构，保守的，改良的；理想的，现实的；革命的，反动的；励志的，颓废的；严肃的，淫荡的；全面的，片面的；夸张的，冲淡的；科学的，迷信

的；宗教的，邪教的；盈利的，亏损的；商业的，赞助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从中我们会看到中国报刊开始走向多元化、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格局，充分展示中国社会风声鹤唳、波涛激荡、变幻莫测的生动画面。

这个历史跨度起始于嘉庆皇帝登基（1796）四年之后，止于宣统皇帝以朝廷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的1912年。在嘉庆帝即位之前历经一百多年的所谓康乾盛世（1661—1796），中国社会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退，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接下来的本书所穿越的百余年时间跨度，“大清帝国处于一个衰落阶段，其整体艺术和民风低于先前的水准”。（《报刊史》原文版，3页）

“有文化的中国人往往易于反思，这是对沉湎于过去而不是现在或未来的过度成熟的文化自然采取的态度。除了少数官员和大商人阶层之外，大多中国人都有一种局部观念，对国家的其他地区漠不关心，更不用说外国了；这是一种地方主义的态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帝国，不仅仅完全自给自足独立于世界，而且也是由其本身都是真正自给自足的地区组成的。”

（《报刊史》原文版，3页）

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普遍缺乏一种对外开放意识，是大清王朝走向覆灭的原因之一。1816年7月，英国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洽谈贸易，“清方要求英使觐见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并令演习

跪叩如式，方能进京；英使坚持不肯”，“由于礼仪上的纠葛而斥退阿美士德使团，则使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英国商谈正常贸易的机会”。这足以说明嘉庆皇帝妄自尊大，把自己的皇帝尊严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抑或把对外贸易看得无足轻重，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他的几位大臣赴天津口外把阿美士德使团接来宫廷，竟谎称“谕以天朝礼节，该贡使等肃恭诚敬，具见顺从”，当朝官员瞒天过海，以如何取悦皇帝为能事，根本不顾也不懂国际贸易会给百姓带来福祉。嘉庆帝察明真相把英国使团驱逐出境之后，又马上下一道谕旨：“各将水师炮械，勤加训练，并留心察探。此后如有英吉利夷船驶进海口，即行驱逐，并不许即旋停泊，亦不准其一人上岸。”（蔡美彪等.《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册，180—181页.）中国百姓惯于把外国人称之为“蛮子”或“夷人”，其中确有不屑一顾的意念。这大体上是一个闭门锁国的历史时期，尽管不同的当朝皇帝都或多或少地实行有限度地与外国往来的政策，尽管朝廷内外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华夏历代王朝的世界体系里，中国既是中央之国，几千年来周边都有很多附庸国，对中央朝廷耳提面命，按时朝拜，定期进贡。“进贡的关系是中国人唯一认可的国际关系，国家之间在法律上平等的观念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中国的国际关系概念与欧洲正在出现的国际法直接发生冲突。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没有可依赖的共同基础。”（L.S.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Inc., 1971, 2nd ed. p.56）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大清帝国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封闭的王朝，“虽然认为中国

历代王朝的任何时期都是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在大清帝国时期，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本质上来讲却比以往更加紧张、更加对立”。（William T. Rowe and Timothy Brook,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2009, p.2）

三、中西方融汇开启比较新闻史学的先河

白瑞华是在上述这一大背景下记述中国本土报刊消亡和新报刊兴起的演变过程。本土报刊主要指公报，是官方办的，包括中央和省属的公报，即京报和辕门钞，刊登官方文件、新闻和评述，“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也可以提供启示”。作者常从国际视野作对比性的叙述，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开启了比较新闻史学的先河，这些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越发显得珍贵。我们不妨从鸿爪泥痕中欣赏吉光片羽：“中国公报实际上是起着监督的作用，发表皇帝的奖励和惩罚、降职、革职以及提拔等消息，警告贪官，鼓励好人。”“就国家大事而言，皇帝往往要求总督和巡抚呈交谏言书，所得到的回应就汇编成文集。况且督察机关充分利用其查明和报道政府官员渎职及其他弊病的职责中所赋予的豁免权，铁面无私地揭露和抨击滥用职权的行为，这是中国专制主义最惊人的事物之一。批评可以上至皇帝本人，甚至可以在公报上发表。检察官的人品如同皇帝和大臣的人品一样，是公报新闻得到高度关注的原因。”白瑞华认为中国的公报比起欧洲各国公报更具有公信力，他指出：“在中华帝国，宫廷言论比在其他帝

国或王国更加令人敬畏，因为皇帝集各种大权于一身。中国的皇帝不仅仅是迪乌斯·奥古斯都，他还是他的家族帝国的族长，是最伟大的教皇，具有天子的品格，可以为无数臣民的利益牺牲自己。凭借融学术和理政于一体的传统，他还是一位文学大师。”

（《报刊史》原文版，12—13页）“从全面来看，政府支持报刊。从专制主义的必要性来看，利用印刷品来攻击政府被视为煽动叛乱或投敌叛国行为。从其他角度来看，报刊可以体现自由的各种优势和劣势。不存在印刷垄断、先期审查、税收、营业许可甚至登记注册。”（《报刊史》原文版，3页）

作者认为影响公报新闻的文化是封建家族文化，体现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公报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为封建统治和等级秩序摇旗呐喊的角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信，这难免会规范和禁锢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满足感的追求在于调解人际关系，避免肉体痛苦，目的在于与自然和谐，而不是控制自然，暗示出一种伟大的社会学，但绝不是物理学”，与旨在征服自然的西方文明中的实验调查、物理科学、企业精神、资本主义等成分格格不入。因此，包括公报在内的本土报刊自然倾向于排斥有关西方社会科技文化的种种内容。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中国人和欧洲人对待周围世界的态度的基本差别，在于中国做出了中断明朝蔚为壮观的海外探险的决定，因为中华帝国是农业社会，明人和满人像印度莫卧儿人一样，对从海外事业获取利益的可能性不感兴趣，他们把海洋留给了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公报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不以盈利为目的，“在中国的文化界，有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

不承认出版物有私人产权，几乎不能把原著当做盈利的手段谋生”。（《报刊史》原文版，15页）

葡萄牙人在15世纪与广州和澳门开展贸易往来之后，荷兰人和英国人纷至沓来，到18世纪中叶，中国在广州和澳门建立起与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西方在华传教活动也十分活跃。截止到18世纪开始，被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皈依的中国人达到30多万。这些都为西方新闻学理念的引入、为中国新型报刊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外文报纸，特别是英文报纸，对于中国新型报纸的形成发挥着作用，当然与传教士办的杂志的作用一样大，也许更大一些。中国人当中开始流传一句话：‘学英语，好发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读英文报纸。外国报纸是新型中国报纸所刊登的外国新闻的主要来源，而且长期以来是唯一的来源。”（《报刊史》原文版，48页）有时候皇帝颁布的敕令并不是首先发表在京报上再为辕门钞所转载，而是首先通过外交官刊登在外国报纸上，之后再传入国内，在新兴报刊上发表。新兴报刊能成气候的原因之一在于得到了北京朝廷的默许，“有些北京官员读沪报，人们普遍认为慈禧太后本人在世纪晚期也读沪报。有一个著名事例讲，北京当局驳回一位巡抚要求查封《申报》的奏折。地位显赫的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在批复中指出，阅读《申报》关乎北京利益”。（《报刊史》原文版，102页）

传教士出版报刊不仅在于宣传西方的宗教思想，而且在于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打破大清帝国对西方在思想意识上的轻蔑，保护在华西方侨民的尊严和利益。“全球各地文明战胜愚昧和错误正在取得迅速的进步——即使心胸偏狭的印度人都已开

始用自己的语言开办几种杂志，只有中国人还原封不动，如同他们在世代代以来一样。尽管我们与他们有着长期的交往，他们依然宣称自己是世界一流的国家，认为所有其他种族都是‘蛮人’。这种妄自尊大的观念对外国居民在广州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往来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通过报刊来展示西方文明的种种先进性，用事实来说服中国人相信“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致力于传播西方国家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产业以及整体进步方面的知识”。（《报刊史》原文版，53页）光绪皇帝曾下旨将其全部结集出版，可见其重视程度。再如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为西方文明辩解的刊物，意在用一种无害的方式来展示欧洲文化和学术的优越性”。（《报刊史》原文版，22页）梁启超对传教士所办报刊予以高度评价：“三年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著，海滨人士稍稍阅《万国公报》，读沪局译书，接西国教士，渐有悟华民之智不若西人者……”（《报刊史》原文版，55页）

四、从新闻学的角度审视中国百年重大历史事件

本书的鲜明特色在于作者善于从新闻学的角度来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不禁会使人们认识到报刊神奇和夸张的扭曲作用。孙中山“在伦敦流放期间是清政府悬赏缉拿其首级的罪犯，遭到中国公使的绑架，被藏在中国公使馆，拟作为疯子押回中国处以极刑。他的朋友康德黎直到把事实真相公布于报刊才能说服当局

采取行动，随之他立即得到释放”。（《报刊史》原文版，112页）“革命报刊成效卓越，令人震撼。中国人民完全没有做好参政的准备。旧帝制的集中化纽带被撕得粉碎，但是中国民众还没有树立起一种整体公民意识。几乎没有出现敌对性的地方主义，但是在广大民众当中也没有政治团结意识。共和国完全脱离实际，随着帝国崩溃出现无政府状态，把爱好和平的人们推向贪婪的军阀的魔爪。”（《报刊史》原文版，120页）作者在30年代就能对推翻大清王朝的革命做出这种入木三分的评述，令人拍案叫绝。近来有学者撰文为大清王朝覆灭喊冤，“大清晚年虽屡有苛政曝光，遂引发戊戌变法之潮，最终惹怒慈禧，酿成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的惨事。可奇怪的是，仅仅过去三年，清廷就仿佛心怀内疚，恍然醒悟，频频开展新政，好像要有意落实被杀君子们的提议……立宪派基本上实现了‘虚君’的梦想。一切似乎已经就绪，皇帝架空，宪政登场，一切似乎都这么顺理成章，革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显得完全没有必要，可是大清还是亡了，看起来亡得好像有点冤”。（鬼今.《晚晴改革VS法国大革命》，《作家文摘》.2013年5月17日，第四版.）该文没论及革命报刊从中所起的作用，白瑞华认为，正因为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亲身经历，才使他对舆论宣传格外重视，从而使革命报刊对大清王朝形成摧枯拉朽之势。今天历经“文革”浩劫的人们对舆论宣传的重要性都有深切的体验，那个时期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檄文，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穷凶极恶的文字狱，震天价响的游行示威口号，广播电视不绝于耳的宣传鼓噪声，批斗会上杀生响亮，忆苦会上血泪控诉，“捧起我那心爱的红宝书啊，纵情歌唱”，“阶级斗争

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各种舆论无所不尽其极，由此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

“这次鸦片战争——首次英中战争中的片段在中国的边远地区都为新闻纸所描述过。这种自欺欺人的写法在各处的新闻中都屡见不鲜，每一个事件都代表着中国的胜利，人们一般都认为英国人被打败了。”（《报刊史》原文版，6页）“十年后法国入侵越南安南地区，派一支舰队沿中国沿海巡逻。美查聘请一位俄罗斯人担任战地记者。《申报》报道中国的失败，结果在上海遭受中国暴徒的袭击，他们宁愿看到把胜利归于中国武装之类的传统报道。”（《报刊史》原文版，68页）美查殚心竭虑为《申报》提供重大新闻，“1871年台湾大屠杀事件产生震惊中外的后果，日后引发一场中日冲突，致使中国名誉扫地。中国人当时绝没有普遍认识到在外交紧张过程中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这些事件却成为重大新闻。日本宣布在琉球岛惨遭屠杀的水手是自己的臣民，要求中国惩办凶手，当中国无动于衷的时候，就在1874年派遣一支舰队到达台湾对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实施报复，向中国索要赔偿。《申报》由于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报道而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报刊史》原文版，67页）

类似这样的叙述贯穿于本书的始末，不禁令人看到对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不管是夸大的还是冲淡的，扭曲的还是逼真的，惑众的还是鼓励的，扫兴的还是扬威的，写实的还是造谣的，都左右着历史的进程，影响着中国未来的走向，其严重程度甚至达到了摧枯拉朽之势，使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从而使中华民族陷入更加苦难的深渊，群龙无首，军阀割据，战事连绵，“千村薜荔

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这部百年中国新闻史，就是一部特殊时期的中国科学、民主和革命历经磨难的发展史，一部新闻可以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历史，向世人警示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其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这也许是本书所昭示的最重要的意义。

由于本人学识浅陋，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以便日后进一步完善。

译者 苏世军

2013年3月

于北京印刷学院

参考文献

Roswell Sessom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1976.

L.S.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Inc., 1971, 2nd ed.

William T. Rowe and Timothy Brook.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2009.

戈公振.《中国文库：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